

文化认同性的变形

WENHUARENTONGXING DE BIANXING

DIOGENES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

 商务印书馆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
文化认同性的变形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 语言卷)
ISBN 7-100-04380-8

I. 文… II. 第… III. 文化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6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

文化认同性的变形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380-8/B·629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 19.00 元

《第欧根尼》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季刊)

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莫里斯·艾马尔

委 员 J. 宾根 D. 迪耶内 R. N. 阿马永 P. 塞内沙尔

国际学术编辑委员会

编 委 J. G. 比迪马(拜罗伊年特大学) I. S. 车(国立汉城大学) Y. 科庞(法兰西学院) J. 拉瓦斯蒂达(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A. 拉鲁伊(拉巴特大学) D. 佩尔蒂埃(里昂第二大学) S. 罗森(波士顿大学) A. 希梅尔(哈佛大学/波恩大学) J. 斯塔罗宾斯基(日内瓦大学) R. 撒帕尔(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 S. 上田(京都大学)

首任主编 罗歇·凯卢瓦(1952—1978)

历任主编 让·多尔梅松(1982—1998)

现任主编 保拉·科斯塔·焦万吉利

《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黄长著

副主任 萧俊明 陆象淦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常绍民 何培忠 黄长著 黄 平 黄育馥

李 薇 刘 霓 陆象淦 王明毅 萧俊明

编 辑 (按音序排列)

贺慧玲 李红霞 萧俊明

目 录

战斗在前沿(代序)	让·多尔梅松 著	
	萧俊明 译	1
文化认同性的变形	萨利姆·阿布 著	
	萧俊明 译	10
“我是他人”:对于同一性的误解	马克·富马罗利 著	
	萧俊明 译	23
大众文化和世界文化:论“美国化”和文化保护主义政策	格雷戈里·克拉埃 著	
	新 蔚 译	36
欧洲文化的乡村根源和 21 世纪的挑战	克洛德·拉费斯坦 著	
	蜀 君 译	65
狩猎运动美学	亚历山大·J. 阿吉罗斯 著	
	黄育馥 译	87
将部族浪漫化:部族文化在文学描写中的固定形式	苏拉·P. 拉思 著	
	戴 侃 译	100
作为全球语言的英语:问题、危险与机遇	伊娃·库什纳 著	
	陈 源 译	118
阴暗时代的语言——卡内蒂、克莱姆佩雷尔、本雅明	奥利维耶·勒莫 著	

	罗 友 译	127
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与文化交流	丹尼斯·西诺尔 著 黄长著 译	147
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北部的混合型语言	斯蒂芬·A. 温棣帆 著 黄长著 译	163
丝绸之路的地理和语言状况	爱德华·特里雅尔斯基 著 元 祯 译	176
少数民族语言——一种文化遗产	马蒂亚斯·布伦青格尔 著 黄长著 译	186
语言消亡的原因和环境	斯蒂芬·A. 温棣帆 著 陆象淦 译	210
语言系统与语言学中的构拟原则	T. V. 加姆克列利泽 V. V. 伊万诺夫 著 黄长著 译	229
翻译,语言学家和各种文化的会合	克洛德·阿热日 著 习 之 译	256
作者简介		270
人名索引		275

Contents

The Metamorphoses of Cultural Identity	<i>Sélim Abou</i>	10
“I Is An other”; Delusions of Identity	<i>Marc Fumaroli</i>	23
Mass Culture and World Culture; on “Americanis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rotectionism	<i>Gregory Claeys</i>	36
The Rural Origins of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Claude Raffestin</i>	65
The Aesthetics of a Blood Sport	<i>Alexander J. Argyros</i>	87
Romanticizing the Tribe: Stereotypes in Literary Portraits of Tribal Cultures	<i>Sura P. Rath</i>	100
English as Global Language; Problems, Dangers, Opportunities	<i>Eva Kushner</i>	118
Language of Dark Times. Canetti, Klemperer and Benjamin	<i>Olivier Remaud</i>	127
Languages and Cultural Interchange along the Silk Roads	<i>Denis Sinor</i>	147
The Silk Road and Hybridized Languag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i>S. A. Wurm</i>	163
The Geographic and Linguistic Status of the Silk Roads	<i>Edward Tryjarski</i>	176
Minority Languages, a Cultural Legacy	<i>Matthias Brenzinger</i>	186

Language Death and Disappearance: Causes and Circumstances	<i>Stephen A. Wurm</i>	210
Language Systems and Principles of Reconstruction in Linguistics	<i>T. V. Gamkrelidze and V. V. Ivanov</i>	229
Translating, the Linguist and the Meeting of Cultures	<i>Claude Hagère</i>	256

战斗在前沿

(代序)

让·多尔梅松 著

萧俊明 译

四十多年来,《第欧根尼》始终在奋争,力争以其手中有限的资源来彰显人文科学在世界各地的进步。这份刊物的问世,归因于一个机构与一个人的巧遇。这个机构即是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它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的,旨在将人文科学领域众多不同的团体重新组织起来;那个人便是罗歇·凯卢瓦,当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名国际公务员。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想给自己配备一份机关刊物,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能够起到联结各个会员团体的纽带作用。

罗歇·凯卢瓦的思想非常明确:他希望创办一份能够反映其“对角科学”概念的跨学科刊物。他对二战之后学术工作的四分五裂颇有感触。当然,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各门科学需要一种高度的专门化。但是他更感觉到,如果说在各门孤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综合尚不可能,那么至少达到一种和睦的时刻已经到来,各门学科不应再有意分离,各行其是地谋求自己的发展,不应再自高自大相互鄙薄。他梦想着这样一份刊物:考古学家可以为了让经济学家来讨论而提出他们的问题,历史学家可以与哲学家达到一种理解。他坚信,这些显然是相隔甚远的学

科或问题之间一旦达到和睦,便会产生新的和丰富的视角。他想让学术体现出各门相关学科特有进路的影响,藉此来丰富学术。故此,他将其规划提交给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大会,后者热情地予以赞同。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将新刊物定名为《第欧根尼》,但并非关涉这位哲学家的犬儒主义,而是因为他打起灯笼去寻找一个人。

如同太多的人类事业一样,或许更甚于其他事业,一份刊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直到1978年去世,罗歇·凯卢瓦二十五年如一日,与《第欧根尼》化为同一。没有罗歇·凯卢瓦,《第欧根尼》便不会存在。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刊物是在两块礁石之间航行,一边是草率的概括,另一边是乏味的博学。他喜欢挂在嘴边并引以为座右铭的一句话是:“没有没有思想的事实,没有没有事实的思想”。凡是带有专著味道的东西都被毫不留情地摒弃,《第欧根尼》的书页中没有它们的空间。让我时常感到惋惜的是,关于康德哲学或腓特烈二世(霍亨斯陶芬王室的)的极为出色的研究就这样被拒绝了——凯卢瓦选择了我作为他的助手,我当时的职位是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副秘书长。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会员组织的学者们在咬牙切齿。如今,这些论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史的一部分。同样,也不能肯定凯卢瓦始终是正确的。但是他始终如一地实施着他的规则。如此,《第欧根尼》获得了国际声誉和威望。

在一个跨学科性这一概念比当今受到更高重视的时代,跨学科性成为《第欧根尼》的标志。“对角科学”的理念遍布于所有文稿。如果说,刊物的理想是以经济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为读者对象,发表一篇探讨神话学对于钱币学的影响的文章,或者一篇考察医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的文章,那么这只是稍许有些夸大其词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第欧根尼》的编辑们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我们不知道什么?”这一主题发起一次学术讨论会的合作计划,表示热烈的欢迎。有了这样

一个主题，跨学科性即刻重新体现出来，“对角科学”这一理念重新得到张扬，并且，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成果并非只是某一领域的成果，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主题包容的所有学科的成果。

然而，1995年3月的聚会与一项更大的规划有关。这项规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委托阿亚姆·瓦塞夫设计，后者在整个规划的构想中起着核心作用。这项规划是关于什么的呢？它计划筹备一系列会议，目的在于确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国际知识中心的角色。这项规划的独一无二性在于确定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讨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关涉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需要将世界各地的所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这项规划的特点是与会者要根据所选议题进行替换，而非确定方向之后便一成不变。其目的是要避免所有的官僚机构，尤其是国际官僚机构那种行政部门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另一个特点是，筹划一系列与每一届学术讨论会相关的其他活动：以刊物和选集——在法国由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发现》系列——形式的出版物、辅助性的讨论会以及在媒体上进行讨论等等。第一次聚会的主题并不仅仅是由凯卢瓦如此钟爱的跨学科和“对角”传统所预先确定的，而且开辟了一个极具独创性和丰富性的研究领域。

乍一看，“我们不知道什么？”这一主题似乎还意味着无话可说，因而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可谈论的。毕竟，谈论一个人所知道的已经相当冒险了。我们又如何能够谈论我们不知道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一个人必须对他所不能谈论的东西保持沉默”似乎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境况。蒙田的“我知道什么？”显然是指向已经知道的东西。回答“我知道什么？”这一问题并不需要我们去说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它意味着去说“我不知道”，并且保持沉默。圣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第十一卷专门论述天地和时间的创造时写道：“我不知道如何能说清楚我所知道的东西，我真愚蠢，甚至不知道我究竟不知道什么东西”。扣子扣上了。

我不知我知道什么,但是只要自冒风险,只要冒着犯错误的风险,谈论我知道什么总是可能的和被允许的。对于我所不知的东西,我还是不知,甚至更加不知,而谈论我所不知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和不被允许的。

显然,论证是围绕着知识的运动展开的。如同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正如芝诺残酷的穿越空间的赛跑的一瞬间所证明的,如同试图追赶上乌龟的兔子,我们知道的和我们不知道的并不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相互凝视的静止世界。如同过去吞食未来,从我们具有的知识中提取零零碎碎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运动从未间断。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尚不知道的由一种连续的流动,一种通常是但并不始终是单向的循环统一起来:还有被人遗忘的传统的或艺人的知识。这种循环允许具备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观察者去谈论对于我们尚不知道的东西的一知半解。

关于未知的问题,因而是一个近似性的问题,一个关于征服的问题,一个关于和睦的问题,一个关于熟悉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边缘的问题。从我们知道的东西中获得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启迪。这条道路的标识是一连串接连不断的发现,而已有的发现又等待、企求和呼唤有待作出的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为我们知道的所吸引。

如此,研究开创了它自己的领域,没有停顿,没有终点。自然而然自行产生的问题是炼金术问题,它允许我们将始终也在增长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转换为不断扩展的我们知道的东西。这是柏拉图认为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而且他的回答是经典的回答: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已经以某种方式知道,而且我们仅仅回想起我们一直无知的东西或者我们已经忘记的东西。正如柏拉图在《美诺篇》中所写道的:“我们能够寻求和理解?”他接着写道的:“我们将永远不能发现和知道的东西之真理始终是我们的责任。”不知其无知的疑难就是这样得到了解决。其实,不存在我们完全无知的东西,我们回想起我们认为自己无知的东

西就足矣了。毕竟,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再被拒绝,陷入那种外在的对之什么也不能说的愚昧。致力于探索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边缘,可以在无意识知识和精神助产术中找到解决方案。问题始终是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知道的与我们不知道的之间显然不可克服的脱节。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204a)中指出:

你必须懂得,凡是神都不追求真理。我们不渴望智慧,因为他们是智慧的——智慧者为什么要去寻求已经属于他们的智慧呢?而且,无知的人也不追求真理,也不渴望成为智慧的。其实,使他们如此无可救药的正在于他们尽管不美不善也不聪明,却沾沾自满,并不渴望他们从未觉得欠缺的美德。

从我们不知道的飞跃到我们知道的始终是个悖论。

我们不知道的和将要被知道的悖论,如同瞬时的位置或龟兔赛跑,在日常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自行解决。正是在实践和应用中,我们不知道什么的问题穿越了所有学术学科,并且,跨过知识领域,穿越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显然与天体物理学、历史、生物学、考古学或艺术史有关,但是也与卫生、计算机科学、股票市场、政治或爱情有关。《追忆似水年华》中有这样极其精彩的一幕:斯万问自己在紧闭的百叶窗后面发生着什么,他怀疑奥黛特又在与情人相会。斯万嘲笑柏拉图式的推测,认为那不过是回忆一个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想起的不过是努力攻克无知领域的学术研究。他痛苦,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无疑也会痛苦。如果他看见了,或许他会比知道还痛苦。因为,如果我们必须相信罗兰·巴特的话(其实他研究的是斯宾诺莎所感兴趣的一个课题),那么看见比知道产生的妒忌更强烈。然而不知道已经足以点燃地狱之火。将其不知转变成有知的欲望,对于情人和心怀妒忌的人而言要比对于研究人员和学者更加难以抵御。情人同样想知道

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就爱情而言,不知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要求以有知来获得满足,遗憾的是,却几乎总是徒劳。

于情人而言,他多少是热情地渴望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凡事如此。比之情人或妒忌心强的人,更有人向自己提出有关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的问题,比如说侦探,更不用说收藏家、多面手或探险家了。侦探知道其他任何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凶犯的姓名,财宝或密信的藏匿地点,他需要的证据等等。从这一意义上讲,侦探为科学家指明了道路:知道一个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关于边缘的研究要成为可能就要在有知与不知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如果说,对于“我们不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几乎不可能为有知而展开工作。

在所有领域,我们的问题都是关于有知一面的,而非无知一面。它并不着眼于大众,那些对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表现为粗陋、沉默、无能和茫然的大众;它的目标是指向有知中稍微逃脱它注意的东西;它的目标是指向可能触及但不能把握的东西;它的目标是指向就要成为“已经”的“尚未”。“我们不知道什么”意味着“我们尚不知道什么”。如同《福音书》中的博爱,有知首先是与当下的事情相关的。

从医学研究到天体物理学,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渐渐消融于进步。新的科学前沿的设立产生了一整套习题。这些习题根据学科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将由胜任的专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次“哲学碰撞”上加以研究。但是所有这些专家都束缚于逐渐入侵所有未开拓的知识空间的总体框架,并且在寻求确定性和必然性的理性化过程中屈服于无知。

我们不妨随意举两个例子:生物学中的艾滋病病毒和天体物理学中的黑洞。比之侦探和情人的例子,艾滋病更需要对“我们不知道什么”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侦探进行调查是因为他的职业就是为社会服

务，情人只不过是痛苦地绞扭双手，而艾滋病之所以更需要作出回答，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在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研究领域，我们的问题只是意味着：“为了挽救因感染艾滋病而将死去的人们我们需要什么？”显然，这些并不是对我们所不知道的可想象的和可能的疾病的空洞推测，而代表着我们在某一领域中有针对性的努力，我们在这个领域耐心地从一个发现走向另一个发现。当艾滋病被攻克时，其他疾病将会出现在我们对之一无所知的视域。就像在艾滋病的情况中，我们首先要集中于解决那些我们知道一些的问题，因为它们已经在人类中造成混乱。

当今我们之所以对黑洞如痴如迷，是因为对于这些天体很难知道它们是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看见它们。对于我们无法观察的东西我们能说什么呢？然而，我们却知道许多有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黑洞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无法看见它们是因为强大的引力使得光线无法从中逃逸。我们还知道，它们的存在在于其隐匿的所在对其环境和其他天体产生的作用。换言之，我们所不知道的和尤为重要的东西正在被大量我们知道的東西所包围，我们所知道的東西极大地刺激了我们，激发我们去更多地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東西。

时间的推移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很久以来一直被视为不可想象的解答。哥白尼、伽利略·伽利莱、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或其他领域中的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无不提供甚至改变了问题的答案。纵观历史，有多少人物以其精神分析的证据而风光一时。然而，即便精神分析尚未成为存在，也不能足以说问题仍然没有答案。问题甚至不以同样的方式自己提出。奇怪的很，更为遥远的人类过去要等待很久才能等到延搁太久才提出的问题。对于三万或四万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比生活在五千年以前的人知道的更多。就“我们不知道的東西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密涅瓦的猫头鹰飞出来得太晚了。

这一问题并不总是开辟一条通过有知逐步征服无知的道路。在宇宙及其历史中,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开的秘密、奥秘和谜。或许,我们能够区别出必然之谜与偶然之谜。一宗无头悬案是一个偶然之谜。日常生活提供了许多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扭转局面的新要素而成为不解之谜的例子。偶然之谜发生于整个历史当中(是谁刺杀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而引发了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于前历史之中(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农人之间有什么关联?);发生于艺术史之中(宙克西斯和阿佩莱斯的作品来自哪里?)。必然之谜的典型代表是著名的哲学迷阵:时间之前是什么?死后是什么?“大爆炸”并非只是一种诱人的假说吗?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对于总的问题的答案。

凡事如不逐渐地加以边缘研究和理性化研究,则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案。“我们不知道什么?”这一问题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精确科学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找到答案,但不是在形而上学中。

* * *

1995年3月的学术讨论会会对其中某些议题进行讨论。随着辩论的展开,将会产生其他问题。《第欧根尼》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只不过是想要将手头的问题的某些要素提供出来,权且作为讨论的起点。

整个学术讨论会,所有讨论以及整个专辑探讨的是一个特殊的疑难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要回到知识的总体。这里毋宁说是在提出相反的问题: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于一个悖论和一种煽动。我们不知道什么?一切!知识是一座小岛,经受着我们无知的洪流的冲击。问题并非像凿壁偷光,借助一道知识的狭孔攻占更大的领域。相反,它把我们置于不确定性海洋的正中央,我们必须设法定位自己,从而重登熟悉的陆地。